

ZHONGGUOGUD

AIZHEXUEMINGZHUQUANYICONGSHU

经译

坛全

中国古代哲学名著

译丛书

全

●建国以来首次集中了儒、释、道三家精华的译文

潘桂明 译注

己

蜀

書



藏密漫谈

刘立千 著

民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坛经全译/(唐)惠能著;潘桂明译注. —成都:巴蜀书社, 2000.10

ISBN 7-80659-065-X

I. 坛... II. ①惠...②潘... III. ①坛经-译文
②坛经-注释 IV. B94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24901 号

责任编辑 黄小石

封面设计 张光明

坛经全译

潘桂明 译注

巴蜀书社出版发行

(成都盐道街三号 邮编 610012)

总编室电话(028)6656816

发行科电话(028)6662019

新华书店经销

成都福利东方彩印厂印刷

成都武侯区机投镇潮音工业小区(028)7445573

开本 850×1168 1/32

印张 7.625

字数 200 千

2000 年 10 月第一版

2000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1-2000 册

ISBN7-80659-065-X/B·11

定价:13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

《中国古代哲学名著全译丛书》

编委会

主 编

任 继 愈

编 委

(按姓氏笔划排列)

方立天	孔 繁	任继愈	牟钟鉴
杜继文	何兆武	余敦康	杨宗义
庞 朴	冒怀辛	段文桂	段志洪
阎 韬	萧蓬父	黄 葵	楼宇烈

执行编委

黄小石

总 序

任 继 愈

在国务院古籍出版规划统一方针指导下，我们与巴蜀书社合作，编辑了这套《中国古代哲学名著全译丛书》。

世界各民族不论大小，都对人类文明有所贡献，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历史，它对人类文明已经做出过伟大的贡献。伟大的贡献，有赖于民族思想文化的成熟。中国哲学，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成熟的标志。

五千年来，中华民族经历了无数的忧患和灾难。但是，忧患和灾难并未使它消沉，反而使它磨炼得更加坚强，在与困难和挫折的斗争中，它发展了、前进了。在前进的过程中，中华民族认识着世界，改造着世界，同时也改变着自身。

中华民族认识世界、改造世界的过程，在中国哲学中得到了集中的反映。其深阔的内容，明睿的智慧，在古代社会，和其他民族相比，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。中国哲学，在当时，无愧于自己的时代；在今天，是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。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前进，随着对历史的深入剖析，中国哲学的内容和它的价值，

将日益被更广大的人群所认识、所接受。

中华民族这个伟大的民族，有责任对世界文明做出更多的贡献。我们今天面临的任务，是要创造新的物质文明和新的精神文明，要完成这个历史任务，从中国古代哲学中寻求借鉴，提高广大人民的文化素养，是个必要的途径。

借鉴中国古代哲学，广大读者首先遇到的麻烦，是语言文字的障碍。本丛书的目的，就是为广大读者扫除这个障碍，使得更多的人能从中国古代的哲学著作中得到启迪，锤炼他们的智慧。

汲取前人的文化财富（包括哲学、文学、科学、艺术），都应该直接取自原作，这是不言而喻的道理。事实上，能做到这一点的，总是少数人。所以从古到今，都有一些人在从事翻译。有不同文字的互译，也有古籍今译。缺少这个工作，人类创造的精神产品，就不可能成为广大人民的财富。

古文今译，并不是现在才有的。司马迁撰写《史记》，曾把商周的文献典籍译成当时流行的语言，树立了成功的范例，使诘屈聱牙的古代文献，被后世更多的读者所理解。古希腊哲学为后世欧洲哲学的源头，今天的欧洲人（包括今天的雅典人）了解古希腊哲学，很少有人直接阅读古希腊文原著，人们多是通过各自民族的现代译文，去了解古希腊哲学，这是学术发展的趋势和方向。

任何译作（古文今译，异国语文互译）都难作到毫不走样。但我们要求本丛书的译文，除了对原文忠实外，还要尽力保持原著的神韵风格。这是我们争取的目标，并希望以此和广大读者共勉。

凡 例

一、本丛书是高层次的中国古代哲学典籍全译丛书。丛书的目的，是为了让更多的读者通过译本即可直接承继中国古代的哲学遗产，使国外读者可直接依据今译本译成外文，以利中外文化交流。

二、本丛书可供研究者参考，也可供一般读者阅读，以适应中国文化研究向深层发展的需要。

三、本丛书选取中国古代著名的，较为难读、又较为完整的哲学论著分批进行今译。第一批选题二十四种。

四、本丛书第一译本均吸收古今各家成果，忠于原著精神，突出哲学思想。

五、本丛书每一译本均分为译文、原文两部分，译文用现代简化字，原文用繁体字。

译文前均有一篇较长的研究性述评，文中各篇多有题解。

译文部分附必要的注释，原文部分附必要的校勘。

六、今译是本丛书的主体部分，译文尽量做到信、达、雅，

要准确信实地译出原意，要用精确、流畅、规范的现代汉语表达出原著的哲学思想，力求体现原著风格韵味。不拘于直译、硬译。

七、注释是今译的补充部分，一般在译文确实无法传达原著哲学思想，或古代语辞确实无法译成现代汉语时，加注释。

注释在充分领会前人成果基础上，断以己意，力求简明扼要，避免繁琐罗列。但有价值的不同意见，必须列出。

注释一般用脚注。

八、校勘体例仿照《二十四史》校点本。本丛书每一种书所依据的底本，尽量选用业经整理的较好版本。

九、本丛书每一译本一般附以哲学范畴、命题索引和参考书目索引。根据具体情况，或设或不设人名、书名索引。

哲学范畴、命题索引以原文为主。

前 言

一 禅宗的成立——《坛经》的佛学背景

《坛经》是佛教禅宗的基本经典。它记载了禅宗实际创立者惠能（又作慧能）的主要禅法思想。禅宗的成立，是一个历史的过程；《坛经》的诞生，有其特定的客观条件。

禅宗是中国佛教最重要的宗派。印度佛教只有“禅”而没有“禅宗”，禅宗纯粹是中国佛教的产物。它因主张用“禅”概括佛教的全部修习而得名，但实际上又并不重视禅。

禅，梵文 dhyāna（禅那）音译的简略，意译为“静虑”、“思维修”，原为印度各种教派普遍采用的修习方式，在佛教思想中具有特殊重要意义。它渊源于印度远古吠陀时代婆罗门教经典《奥义书》所说的“瑜伽”（yoga）。瑜伽，意为静坐调心，制御意念，超越喜忧，体认“神我”，以达“大梵”境界。瑜伽的修行，纯属内观亲证。据佛教典籍《俱舍论》、《瑜伽师地论》等解释，通过“心注一境”、“正审思虑”的禅定修习，可以制服烦恼、引发智慧，超脱世俗、抵达彼岸。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证得涅槃，实际即得益于禅。中国佛教学者通常把禅与定（samādhi，

三摩地、三昧)合称,成为含义更为广泛的“禅定”。

佛教传入中国,同时也带来了禅法。禅法在中国同样受到特殊重视。道安说:“匪禅无以统乎无方而不留,匪定无以周乎万形而不碍。”(《出三藏记集》卷六《大十二门经序》)就是说,禅定可以囊括佛教的一切方面。智顗也认为,“此乃伏结之初门,观是断惑之正要”;“止是禅定之胜因,观是智慧之由借。”(《修习止观坐禅法门》)禅法本身已包含了止和观两层意义,所以止观方法的核心是禅定。

随着大量禅经的翻译以及各类禅法的具体实践,至南北朝时期,中国境内大致同时流行着三种主要禅法,它们是:以数息为要务的“安般守意”小乘禅;以对治和观佛为主要内容、兼融了大乘的小乘禅;以证悟大乘佛教“如来藏”佛性为根本的如来禅。它们争取徒众,扩大影响,发展势力,乃至相互构难,造成禅法的多元化展开,各种禅学派系先后形成。

相传菩提达摩(或作达摩、达磨)自南天竺泛海而来,登陆于南方沿海,并于刘宋后期进入北魏境内,在嵩山一带教授弟子,传播新型禅法。他的传法活动为后来禅宗的成立做了前期准备。

据道宣《菩提达摩传》记载,达摩所授禅法,其主要内容包括“理入”和“行入”两个方面。其思想特点,是“藉教悟宗,深信含生同一真性,客尘障故,令舍伪归真。凝住壁观,无自无他,凡圣等一,坚定不移,不随他教,与道冥符,寂然无为,名理入也。”(《续高僧传》卷十六)认为通过“凝住壁观”,即以“理”作为观想的对象,可以达到“与道冥符”即与“理”相契的境地。所谓“壁观”,是指心如壁立,不偏不倚。“深信含生同

一真性，客尘障故，令舍伪归真”，体现的是如来藏（真如）缘起思想；在达摩所依持的四卷本《楞伽经》（刘宋求那跋陀罗译）中，也反复申述这一思想。因此，达摩的禅法，带有以理悟与实践并重的色彩。

达摩弟子可以被确认的，有慧可、道育二人。由于慧可的传法活动，使对《楞伽经》的依持得以继续，“楞伽师”的传承体系得以成立。自《楞伽师资记》诞生以后，达摩——慧可——僧璨——道信——弘忍——神秀这一楞伽师的传承谱系逐渐成为定论。

慧可及其弟子僧璨等因受北方禅学派系的排斥，又值周武帝的灭佛，开始向南方转移，进入江淮之间的山林地区。至道信、弘忍时代，楞伽师的组织和学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。

道信（580—651）于六二一年起住蕲州黄梅破头山（又名双峰山，在今湖北黄梅境内），前后三十年之久。他“再敞禅门，宇内流布”（《楞伽师资记》）；“大作佛事，广开禅门，接引群品”（《历代法宝记》）。弘忍（601—674）是道信的嗣法弟子，三十年不离道信左右。玄奘《楞伽人法志》说他主张“役力以申供养”，“四仪皆是道场”；提倡“静乱无二，语嘿恒一。”（《楞伽师资记》）这意味着，他已开始把禅贯彻到日常生活之中，改变了凡禅必坐的传统。《传法宝记》也说，弘忍“常勤作役，以礼下人”。

道信住黄梅西北的双峰山，弘忍住双峰山之东的冯茂山，又名“东山”，故其禅法号称“东山法门”。“东山法门”实际上包含了道信和弘忍两代禅师的禅法思想。

据《楞伽师资记》记载，“东山法门”有两个要点。一是

“依《楞伽经》，诸佛心第一”；二是“依《文殊说般若经》，一行三昧”。

道信和弘忍仍然奉持《楞伽经》，并从“方便通经”角度曲解“佛语心第一”，提倡专于内心用功，重视“心”的作用。“一行三昧”出自《文殊说般若经》。所谓“一行”，也就是指法界一相，无有差别；“三昧”，就是三摩地、正定。经中指出，在实践一行三昧之前，先须研习般若波罗蜜，按经典所说修学，以领悟法界无碍无相之理。以一相为三昧的境界，即以法界为所系缘；法界则无所不包，平等不二，无差别相，不退不坏。《师资记》所谓“不取相貌，系心一佛，专称名字”，是指坐禅念佛的功夫，这种念佛既是唯心念佛，又是实相念佛。

“东山法门”特别重视大乘经典所表达的“即心即佛”思想，目的在于排除外向求佛的传统教义，包括偶像崇拜、净土信仰、关心经教、着意修持等，从而把解脱的希望转移到内心的调节上。

在坚持如来藏佛性思想的同时，“东山法门”还注入了般若性空内容。道信在《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》中，曾三度引用般若经典，甚至以《金刚经》所说“灭度一切众生已，而无有一众生实灭度者”来说明“修道得真空者，不见空与不空，无有诸见”的实相原理。在般若学说的基础上，他们发展了传统的“安心”说。道信说：“亦不念佛，亦不捉心，亦不看心，亦不计念，亦不思维，亦不观行，亦不散乱，直任运。亦不令去，亦不令住，独一清净，究竟处心自明净；或可谛看，心即得明净。”（《楞伽师资记》）这里表达的是一种任运自然的禅法思想，对于以往楞伽师相传的壁观坐禅和头陀守戒来说，无疑是一项重大突破。

弘忍时代，“东山法门”已蔚然发展成为禅门一大系统。弘忍的门徒难以确计，据《楞伽师资记》所载，在他去世前，曾述及能传其禅法的弟子有十人，说：“如我一生，教人无数，好者并亡。后传吾道者，只可十耳。我与神秀，论《楞伽经》，玄理通快，必多利益。资州智洗、白松山刘主簿，兼有文性。华州慧藏、随州玄约，忆不见之。嵩山老安，深有道行。潞州法如、韶州惠能、扬州高丽僧智德，此并堪为人师，但一方人物。越州义方，仍便讲说。”最后又对玄贇说：“汝之兼行，善自保爱。吾涅槃后，汝与神秀，当以佛日再晖，心灯重照。”

据《传法宝记》认为，上述弟子中，法如奉持弘忍十六年，曾受弘忍的密传。在弘忍去世之后，法如先在淮南，后至洛阳，最后长住少林寺传授禅法。他的禅法“祖范师资，发大方便，令心直至，无所委曲”，即以弘忍所传为原则，注重一心的修习，开方便法门。在神秀开法之前，他已成为北方禅界的核心。其弟子惠超、妙思、奇拔、远契、元纵等，也都持《楞伽经》“以为心境”。道安（老安）也曾先后从弘忍受学近二十年。道安弟子有破灶最、邺都圆寂、净藏、义琬等。这一系的禅杂有神秘、直觉的契印法，或逍遥弗羁，或放旷郊廛，多神怪之行。玄贇在安州（今湖北安陆），后入洛阳，被贵族禅师净觉一系推奉为师。智洗离弘忍后，住资州（今四川资中）德纯寺，成为“净众·保唐”禅系的先驱者。

弘忍的另一弟子神秀（约606—706），据《传法宝记》等记载，他少为诸生，游问江表，精通各家经典。二十岁受具足戒，而锐志律仪，渐修定慧。年四十六，投弘忍门下，奉持六年，不舍昼夜。后涕辞而去，潜为白衣，行踪不详。或说在荆州天居寺

十余年，不为时人所知。仪凤（676—679）中，取得正式僧籍，住荆州当阳玉泉寺。他在寺东之山地别创兰若，荫松藉草，一时“就者成都”，“学者如市”，以至“庵庐雁行于邱阜，云集雾委。”（宋之问《为洛下诸僧请法事迎秀禅师表》，见《全唐文》卷二四〇）神秀在法如去世后，开始正式传法，但因他的影响远在法如之上，故后人一般认为他便是弘忍的传法弟子。这是一种误解。

事实上，根据现有资料，弘忍终究未曾指定他的具体（某一人）继承人。弘忍门下，人才辈出，十弟子各具千秋，均可为一方人物，弘济禅法。据《传法宝记》说，当时采用的是一种“密来自呈，当理与法”的传法方式。这种方式表明，由达摩创始的楞伽师递相单传的局面行将结束，而“分头并弘”的新的形式就要成为历史的事实。《楞伽师资记》并举神秀等十人，《传法宝记》则并举法如、神秀二人，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。

师徒单传与分头并弘的区别，应是禅法传承中的一件大事，这里蕴含着即将揭开革新中国佛教的重要条件；分头并弘的结果，最终将以一个新的佛教宗派的姿态取代楞伽师的地位。惠能在去世前也有与弘忍类似的遗言：“汝等拾弟子近前。汝等不同余人，吾灭度后，汝各为一方头。”（《坛经》）这表明，禅法的分头弘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。

客观地说，弘忍嗣法弟子之争，在法如、神秀、惠能时代，还未出现明显的迹象。从楞伽师学说传承的角度看，法如和神秀比其他同门具有更为优越的条件。但是，从禅学的发展趋势看，由于惠能具有自己的独特见解，十分有益于光大禅门，因而弘忍有可能对他寄以厚望。因缺乏可靠的史料，我们对弘忍与惠能的关系了解甚少。可以确认的是，在弘忍时代，惠能决不是惟一能

够嗣法的弟子。当时毕竟还是楞伽师时代，尚无强烈的宗派色彩。

禅师们的分头并弘活动有效地扩大了禅法的影响，吸引了众多如醉似痴的追随者，并受到从地方至中央各级官僚的普遍关注。以宋之问上表请迎神秀入洛为契机，武则天先后接见以神秀为首的弘忍弟子，如老安、玄约、智洗、玄曠等人，并称赞“东山法门”是天下行禅修道者的极宗。原本隐遁山林、自食其力的禅者，从这时起已逐渐为朝廷所用；一些禅师一旦成为帝师，随着就有一批贫困的禅弟子上升为富有的官僧，原先的质朴便不能继续保持。这并非弘忍及其弟子的本意，而是历史对禅法的必然要求。禅系内部既然出现重大分化，于是，争夺禅宗正统，争取官方承认和扶植的斗争也就激烈起来。

神秀及其弟子普寂、敬贤、义福、惠福等人活跃于北方，以两京为中心弘传禅法，君临一切禅众，加上时处盛唐，该系声势显赫，天下禅者无可比拟。但是，北宗始终未能将全国禅众统一起来。禅法思想上渐修与顿悟的争论，禅宗新贵与不安于山林贫困的禅众间的矛盾，导致了南北禅宗是非傍正的长期争论。

首先发起争论的，是惠能弟子之一的神会。神会（684—758）曾在荆州玉泉寺随神秀学习禅法三年。大足元年（701），因闻岭南漕溪惠能禅师盛扬法道，学者众多，便前往求法，居住数载。惠能去世后，他离开漕溪，往各地游历，以增长见闻。开元二十二年（734），正当神秀门下炙手可热之际，神会在滑台（今河南滑县）大云寺召开无遮大会，与当时北方著名学者崇远法师展开辩论。他宣称，惠能建立和传授的这一派神系，是菩提达摩嫡传的禅宗，名“南宗”；因此，与之对立的神秀、普寂一

派也就成了“北宗”。他指出，北宗“传承是傍，法门是渐”，南宗却得了弘忍的“顿门”嫡传，并受传宗信物法衣。天宝四年（745），兵部侍郎宋鼎请神会入东都，住荷泽寺，使他有机会大力传播“曹溪了义”，宣扬“荷泽顿门”。惠能禅宗在中原地区逐步得到推广，引起人们重视，神会有首创之功。

以神秀（及他的弟子辈）为代表的北宗禅，基本上继承了“东山法门”的主要精神，依《楞伽经》，行“一行三昧”。据《楞伽师资记》说，神秀在弘忍门下“受得禅法。禅灯默照，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”。在他所著的《观心论》中，论证了自达摩以来历代相承的“观心”禅法，进一步确认禅定、念佛在楞伽师中的地位。所谓“观心”，从不同角度理解，又可名之为“修心”、“摄心”、“了心”。其总的原理，就是通过禅定修行，息灭妄念，拂拭客尘，发现禅者本具的清静佛性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照，进入与真如相应的境界。

由于受《起信论》和华严经教的影响，北宗还继承了楞伽师依赖经典和渐次修习的特点。宗密说，神秀系禅法的主要特征是“拂尘看净，方便通经”（《圆觉经大疏钞》卷三之下）。前者指渐修，后者指不离经典。正是出于对禅定的重视和对经典的依恃，使北宗禅较多地保持着传统佛教的色彩，难以摆脱因袭的保守观念束缚，无法在思想领域和实践方面获得重大进展。

更为重要的是，北宗的繁荣和鼎盛局面是在皇室、贵族、官僚的支持下出现的。它的社会基础，主要是那些开始走向衰落、却尚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的世族以及他们的知识分子。北宗禅师大多为王公贵族、世家子弟所崇信，部分著名禅师本身就是名门弟子，具有政治、经济上的优越感。这一背景，决定了北宗的历

史命运。

按照传统说法，禅宗创始于南北朝时期，其初祖为菩提达摩。实际上，禅宗的真正建立，应从唐代六祖惠能算起。

历史上的禅宗，虽说与达摩禅有思想上的某种联系，在法统上也有血脉之情，但其思想原则和实践方式是由惠能奠定的。惠能禅宗与传统意义上的禅法、以及南北朝各家禅学有重大区别，它是中国人以自己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建立起来的。从达摩到弘忍，这五代法裔相传的过程，可以看做禅宗的预备阶段，也可称为禅宗的先驱。禅宗是中国佛教创造和革新运动的产物，至惠能时代，禅宗建立的主客观条件开始成熟：长期的定居聚徒，使寺院经济得到壮大，为宗派的活动提供了物质保证；经过几代人的开发，禅的传播区域不断扩大，影响及于大江南北；在“东山法门”弘传的基础上，以惠能禅学为中心的宗教哲学受到广大禅僧和世俗人士的支持。安史之乱后，惠能禅系势力迅速发展，取代“北宗”地位，成为禅门主流。故后世论禅，往往把“南宗”直接等同于惠能禅宗。

二 佛教的革新——惠能及其《坛经》

《坛经》是惠能说法和生平事迹的记录。惠能（638—713），俗姓卢，其父行瑫官于范阳，后左降迁流岭南新州（今广东新兴）。他出生于岭南，因父亲不久即去世，故家境贫困，母子相依为命。

除了生卒年代古今学者从无异说外，有关惠能的生平事迹，